2301

昆明文史资料选辑

第28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昆明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八辑

人物专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云南省昆明市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一九九七年二月

昆明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云南省昆明市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邮 编:650021
电 话:3613305、3613233
地 址:昆明市云瑞西路 29 号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8
字　数	17 万		印　数 1—2000
1997 年 2 月第一版		199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云南省内部期刊准印证第 207 号
昆明市政协机关印刷厂印刷　电话:5152155
地 址:昆明市环城北路 195 号　邮 编:650051
(内部发行)工本费:7.50 元

主编　杨孝文

编委　卜保怡　朱抗美　王　道　张民义
　　李建恩　刘宝锁　李安民　张　骞

本辑编审人员

审定　杨孝文

编辑　卜保怡　李建恩　张民义
　　王　道

目　　录

缅怀周保中将军 …… 侯良辅（1）
赵增益同志传略 …… 张一鸣（3）
吴作民同志在云南 …… 冯秉衡（45）
杨克成回忆录 …… 杨克成口述　何开明 周嘉禾整理（53）

忆李公朴先生 …… 叶　鑫（104）
徐悲鸿的云南之行 …… 马宝忠（109）
朱自清先生的教学与科研 …… 杨光社（117）
回忆我的叔父何瑶 …… 何弘德（126）
王旦东事略 …… 亚　丹（134）
吴富恒与云南省立英专 …… 周崇德（148）
怀念罗伯特·温德教授 …… 周崇德（156）
缅怀李福钧同志 …… 齐灿邦（162）
致敬“中国橡胶之母”引种人刀安仁 …… 张承源（177）
抗战期间龙云让公馆供西南联大使用 …… 贺联奎（183）
云南邮政事业开拓者张培信
…… 张一鸣 张一飞 张一方（189）
名实相符吴附子 …… 吴荣祖（194）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C80/24

鲁元将军事略 …… 鲁天宁　李国庆（200）
先父李宗黄与昆明市政 …… 李天健（209）
方仲伯老师二三事 …… 陈长平（216）
甘芳生平纪实 …… 王兴麒（222）
宋嘉晋二三事 …… 张一飞（229）
追怀陈开国同志 …… 李建恩　张民义（235）

历史文化名城昆明简介之二十四

圆通山聂耳亭溯源 …… 胡　鉴（243）
昆明·藤泽友谊馆 …… 张　弘（246）

缅怀周保中将军

侯良辅

周保中同志逝世已32年了。他是著名的东北抗日联军将领，伟大的抗日民族英雄，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白族人民的好儿子。周保中的名字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是耳熟能详的，对二战时期的朝鲜人、俄罗斯人也是熟悉的。我是在1950年2月24日，省委召开的地、师以上干部会议上认识他的。这次会议决定我兼任大理地委书记。去大理前的一个夜晚，我和张子明同志去拜访他，请他做指示。因当时他已休息，我们就准备走了。但他却穿着睡衣从楼上下到客厅热情地接见我们。他谈得非常亲切、坦率；他说："你们兼地方工作，云南的工作就会很快开展了，我对你们很放心，你们大胆放手的干就是了。"同年秋天他到大理视察工作，住在四十师师部，我有幸和他长谈过几次。他谈过抗日联军的情况：他说："在东北是14年的抗战，起初是游击队、义勇军、救国军，逐渐发展组建为十一个军，约有五万多人，后又改为三个路军。我是二路军总指挥兼政委，辖有4个军。又因斗争残酷改为几个支队。到1942年底，抗日联军已不足千人。后为保存革命力量，转移到苏联边境。"他说："斗争非常残酷，环境异常恶劣，艰苦。从1942年初到年底，敌人对抗联进行了细密的'搜剿'，在大山里反复搜剿，把一切密营和地下粮食破坏，还把地上的种植物完全摧毁，并

实行严厉的经济封锁。还在黑龙江和其他有抗日联军活动的地区实行大检举，成千上万农民被逮捕、拷打、杀害。武装特务深入大山，放火烧林，施放毒药。日寇还搞诱降，留下酒、粮食和劝降书。然而共产党人为民族解放事业，宁断指裂肤，铺冰盖雪，吃树皮草根，用泥土、水草裹治战斗创伤，不屈不挠地继续斗争。”他还说：“我军袭击敌人一般只能在夏秋两季，每次在突然袭击敌人之后，要急行军几百里，避免敌人的追击。敌人搜剿山林，追寻踪迹时，我们还得巧妙地消灭踪迹，迅速急走。几天吃不上东西，有时只能吃糠和野菜，有时连糠和野菜也只能生吃，再加雪块。”我当时感到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才能坚持14年抗战。

他还谈他在苏联受审查时遭到左倾错误路线的迫害。他说“硬要你承认自己是叛徒、特务，采取车轮战，不能吃，不能睡，软硬兼施，根本不视为同志。有时我想‘死了算啦’，又想到决不能死，死了就说不清了。决心坚持实事求是，看你怎么办，就这样过来了”。他还说：“现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是正确的，要坚决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团结绝大多数同志，把征粮、清匪、反霸搞好，下一步的工作就好办了”。

在几天的接触中，我对他的耿直、坦率、诚恳、俭朴有很深的印象，对他非常敬仰。后来他调到中央工作，我转业到地方，和他就没有接触了。八十年代后期他的夫人王一知同志把《周保中文选》送给我，我非常感谢她。

人总是要死的，有些人虽然死了，但在人们心里却化作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丰碑。周保中同志就是这样的人，我永远怀念他！

赵增益同志传略

张一鸣

作者说明：1997年2月27日，是原中共昆明市委第一书记、政协昆明市第一至五届委员会主席赵增益同志逝世四周年。为了缅怀逝者，寄托哀思，应本刊编者之约，特撰写此文。

笔者1950年4月即调至市委机关工作，自1954年12月增益同志主持市委工作以来，作为市委办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员，曾多次跟随他下乡下厂调研和赴省外考察，在日常文件、报告起草上经常得到他的指导。“文革”期间又一块遭劫受难。1979年4月增益同志主持省革委工作时，又被提名调到省革委（后改称省政府）办公厅工作，直至1982年8月增益同志调离云南。1992年9月在他住于上海华东医院治病时，又受云南省政府办公厅委托，赴沪探望。

本文有关云南部份，系根据笔者在增益同志身边工作多年的亲历，并参阅了其他同志的回忆文章综合写成；有关部队和川东、江西部份，则全部采自他的一些老战友、老部下的回忆文章。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戎马生涯15秋

增益同志于1920年1月出生于山西平定县宋家庄，读过6年私塾，当过4年店员。三十年代中期，受“12·9”运动和长城抗战影响，萌发革命热情，于1936年冬在家乡参加“牺盟会”（“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的简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和“抗先队（“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的简称，是党领导下的抗日群众组织），积极投身救亡活动。1937年5月考入山西新军国民军兵官教导第五团，它是山西青年抗敌决死总队第一纵队（薄一波同志任政委）的前身之一，是中国共产党推动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建立起来的，这个团的军事干部统一由阎委派，政治干部则是以政治部主任李一清（解放后曾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邮电部第一副部长）为首的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另有从中国工农红军聘请来的少数游击战教官。这样一支队伍，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斗争，党要把它建成人民武装，阎锡山则要把它变成军阀的工具。在这一斗争中，血气方刚的增益同志始终站在前列，因而被旧军官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屡遭斥责，处处刁难，动辄罚额外勤务甚至关禁闭。尖锐的斗争加速着他的成长。1937年10月，增益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山西即成为日本侵略军的进攻重点。为了执行党中央在太行山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战略部署，决死一纵队在薄一波同志率领下，进入晋东南的沁县、武乡地区。随后，李一清同志奉命到原籍昔阳县组建晋东抗日游

击队，决定从决死队抽调30多名干部和学员作为骨干，增益同志亦在其内。他当时还被无理关押中，但因名单是薄一波核准的，旧军官只好遵命释放。他们一行来到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部驻地的辽县（今左权县）县城，参加了“游击训练班”的学习。师长刘伯承、政训主任（相当于政委）张浩亲自授课，时间虽短，受益甚多。一个月后随李一清到达昔阳县东部，开始了游击队的组建工作。1938年4月，晋东抗日游击队正式成立，不久就发展成为有一千多人的人民武装队伍。这支部队用了山西省第三专员公署的招牌，却没有阎锡山派来的军官。一开始就以司令李一清、政治部主任赵武成、副主任宋志兴等5同志组成的中共党委为核心领导。增益同志是党委委员并任政治部组织股长，并一度出任九龙支队政委。他在党委领导下，对晋东游击队政治工作建设，特别在干部工作和党的建设方面作出了贡献。他为人热情，平易近人，善于团结干部，不论是从决死队抽调来的干部，从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分配来的干部，还是当地新吸收来的土生土长的青年干部，都能一视同仁，量才使用。他十分重视党的建设，把已有的党员尽量调整到没有党员的单位，依靠他们积极而有选择地发展进步青年入党，并多次举办新党员轮训班。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努力，具有相当素质的党员人数已占到部队总人数的20%，保证了党对这支队伍的领导。

1939年冬，阎锡山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向山西新军发起进攻。为了适应斗争形势需要，晋东游击队归属晋冀豫边游击纵队（后改称晋冀豫军区）指挥，番号改为边纵六团；1940年6月又同边纵一团合编为一二九师新十旅二十八团，增益同志继续担任政治处组织股长并兼总支书记。在

当年8月八路军发起的百团大战中，随同一营行动，参加了破袭正太路、攻克狼峪车站日军据点的战斗。完成任务后，他奉命率领团直属队撤离正太路，途中于苗凹掌遭日军炮击负伤，一块弹片一直留在他的身上。1941年新十旅与太行军区第二分区合并，增益同志调往分区政治部组织科工作。是年底，分区领导决定抽调班、排、连干部30余人，组成短小精悍的别动队，由增益同志担任队长，深入敌后开展对敌斗争。在年关将近时，增益率领的别动队穿过封锁线进入平定、寿阳的正太路沿线地区，在当地县委和政府的配合下，果断插入敌独立第四混成旅团部驻地阳泉附近，并于农历除夕在新村据点的碉堡下，出其不意地逮捕了作恶多端的汉奸王某。尔后再把经由我专署判处王某死刑的布告遍贴沿途村落，并通告平定县城及据点伪职人员，要他们以王犯为戒，改过自新，真正做到“身在曹营心在汉”。这一强大的政治攻势，激励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信心，震慑了敌伪阵营，陆续争取到许多伪职人员转变态度，主动与抗日政权联系，打开了新的工作局面。这支别动队开创了新的斗争方式，成为武工队的前身。在总结他们经验的基础上，分区很快组织了几支武工队，与地方政权和地方武装相配合，经常活跃在敌占区和游击区，打击小股日伪军，除奸反特，瓦解伪军、伪组织，破坏了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把抗日影响扩展到了敌后城市和据点之内。增益同志还利用别动队搜集到的大量敌伪材料，经过研究分析，向领导提出了一份开展敌区工作的报告。这份报告，受到当时正在二分区视察工作的一二九师李达参谋长的赏识，也深为分区曾绍山司令员和八路军前方总部情报站刘文华站长所重视。

从1942年夏开始，增益同志被调动从事部队侦察、情报和参谋工作，先任二分区司令部侦察股长。1943年初，一二九师（兼太行军区）司令部成立情报处，并在二分区司令部设立情报分处，曾绍山司令员兼任处长，增益同志任副处长。1945年8月，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情报处长、太行八分区参谋长、三纵七旅司令部参谋长、纵队司令部作战处处长。1948年初任中原军区运输司令部参谋长。在八分区部队解放沁阳时，他负责指挥突击队攻城，再次负伤。后参加了解放洛阳、宛东、宛西、襄樊、淮海诸战役。

增益同志在从事侦察、情报和参谋工作中，根据“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军事原则，十分重视对敌情的调查研究，经常注意收集研究缴获的敌伪档案资料，收听敌台广播，查阅敌伪报刊，并派出侦察人员至敌占区组织秘密情报通信所，与在群众中组建的大众情报网相结合，以保证能向指挥机关提供准确、及时的情报。在二分区工作时，半年内他曾4次化妆成商人，带着“良民证”，深入敌占区会见秘密情报工作人员，指导部署工作。

1949年春，增益同志被调任二野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政委谢富治）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参加了渡江战役和解放大西南的重庆、成都战役。

转业地方工作

1950年初，增益同志告别了15年的戎马生涯，转业至地方工作，任中共川东区党委（驻重庆北碚，区党委书记谢

富治）副秘书长、秘书长，积极参加接管城市、恢复发展生产、农村清匪反霸、征收公粮、土地改革等工作。增益同志的老战友、原四川省委宣传部长明朗同志在回忆文章中曾讲到这样一件事：土改时增益到合川县搞试点，农民发动起来后，对地主有吊、打、用刑等过火行为，于是搞了七条限制性措施。区党委一位负责同志检查工作时，认为这七条措施束缚了群众手脚，是“右倾”，大张旗鼓地进行批评纠正。增益想不通，就向西南局写了一封申诉信，当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同志看了这封信后，就对区党委这位负责人说：“你们给赵增益辣椒面放得太多了。现在看来，取得全国政权后进行土改，硬搬打翻在地踏上一支脚的做法，未必正确，增益同志的见解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1952 年 9 月 1 日，中央决定撤销川东、川西、川南、川北 4 个行政区，恢复四川省建制。10 月，增益同志调云南工作，担任中共昆明市委第二副书记兼昆明市总工会主席、党组书记（主要工作在市总工会）。当时担任总工会副主席的徐仁信同志在回忆文章中讲，增益同志把工会作为党联系工人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看得很重要，对各级工会干部要求很严，他自己更是亲自实践，带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作出表率。他下基层蹲点，经常一蹲就是十几天。并带头和工人群众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吃在工人食堂，住在工人宿舍，白天下车间班组参加劳动，晚上至工人家中访问。当时的工作条件很差，市总工会只有一辆破旧的吉普车，增益同志和其他干部一起下基层时，经常是骑自行车，有时到离城较远的昆钢、马街工矿企业蹲点，也是骑上自行车来回跑。由于他工作深入，平易近人，干部和工

人群众都信任他，愿意和他讲心里话，这样就能及时掌握各类人员的思想动态，了解工作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把矛盾和问题及时处理在萌芽过程中。

主持昆明市委工作十二年

1954 年 12 月，原中共昆明市委书记马继孔同志调任云南省委第一副书记，仍兼市委书记；增益同志以副书记主持市委工作，1956 年 2 月任市委第二书记（继孔同志兼第一书记），同年 6 月在中共昆明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市委第一书记，直至 1967 年“一月风暴”中被造反派非法夺权，共主持市委工作 12 年。经历了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三年经济调整、“文化大革命”等重要历史时期。

增益同志主持工作期间，在中共昆明市委的集体领导下，在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昆明市的经济、文化建设和党的建设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在经济建设首先是工业建设方面。解放前昆明的工业基础比较薄弱，除了抗日战争期间内迁和资源委员会、云南人民企业公司留下来 的几家有一定规模的军工、机械、电工、电力、纺织企业（解放后均划为中央和省属企业）外，市属地方工业基本上是一片空白。1956 年公私合营后，市政府才成立了专管的昆明市工业局，当时全市只有 40 多家手工作坊式的小企业。就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增益同志与市工业局的领导同志一块深入企业调查研究，解决公私合营后遗

留的政策问题，分行业审查以合并和转向为主的工业调整方案，经常听取工商协调汇报，积极筹措资金，新办了一批企业，生产市场紧缺、人民需要的产品。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期间，昆明虽不是国家建设重点，却是省内重点建设城市，全市重点进行机械、冶金、化工、建材、电力等建设，总投资1.1亿元，占当时全市基建投资总额的44%，形成8000多万元的工业固定资产。昆明水泥厂、普坪村发电厂、云南机床厂、云南印染厂、云南砖瓦厂、昆明拖拉机厂、昆明开关厂、安宁化工厂等一批新建企业先后投入生产。一批老企业如昆明钢铁厂、昆明机床厂、昆明电线厂、昆明电机厂、昆明冶炼厂、昆明卷烟厂、云南纺织厂等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扩建。1958年6月，省委要求以较短的时间，用最快的速度，把昆明市建设成为一个以机械制造业为中心的、为全省工业化及农业机械化服务的现代化工业基地。一般主要产品从最小到最大的都要能够自力更生，自己制造；要在工业产值、产品数量、质量及技术水平上赶上和超过全国一切中等城市，并向大城市看齐。市委及时传达了省委的这一重要指示，制定了具体的贯彻措施。1959年4月召开的中共昆明市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上，增益同志代表市委作了《为把昆明建设成为全省工业基地而斗争》的工作报告，提出了“苦战三年，把昆明建设成为全省工业基地”的战斗任务，再一次掀起了工业建设的新高潮。1962年他又提出了“学上海”的口号，亲自率团赴上海考察（我也随同前往），重点是工业战线，回昆后先后组织了有工厂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配套的学习队上千人，分批、分行业，有针对性地到上海各有关工厂对口学习，跟班

劳动。这一大规模的学习活动，对于提高昆明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开发新产品，提高产品质量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着力抓工业建设的同时，对于农业特别是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也下了很大功夫，建成了一批大中型水库如松花坝水库、宝象河水库、松茂水库、柴河水库、双龙水库、车木河水库等。小型水库更是星罗棋布，遍及各县、区，从而大大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仅三年大跃进期间修建的水库就使全市保水田面积由 1957 年的 29.8 万亩增加到 1961 年的 49.7 万亩，增长 67%。1966 年与 1954 年比较，全市社会总产值增长 21.04 倍，工农业总产值增长 31.2 倍，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 43.8 倍，农业总产值增长 29%。新建工业企业 279 个，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中，钢增长 21 倍，钢材增长 28 倍，发电量增长 12.5 倍，水泥增长 25 倍，化肥增长 591.6 倍。新增固定资产 4.9 倍。

增益同志对昆明市的教育、文化事业十分关心。1955 年 2 月市委召开了中等学校工作会议，3 月召开了高等教育工作会议，他在两个会议上分别作了报告，强调要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要关心教师的进步和生活，进一步改善教师待遇。在当年 11 月召开的中共昆明市第六次代表会议上，他代表市委作工作报告，强调必须注意加强文教卫生工作，加强党对学校工作的领导，认真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以后在市委常委讨论文教工作时，他又反复强调“抓教学的关键在于领导钻进去，学校也要走工厂钻生产的路子，我看有必要搞一个时期全党钻教学的问题，要求钻出几个内行来”。他身体力行，1958 年 2 月 14 日市委作出《关于市级机关领导干部深入基层的规定》，他分工深入联系的基层单位就是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